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608
26 September 1985

CHINESE

第二六〇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9月26日星期四，下午3点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杰弗里·豪爵士

成员国：澳大利亚

布尔基纳法索

中国

丹麦

埃及

法国

印度

马达加斯加

秘鲁

泰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美利坚合众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海登先生

基索先生

吴学谦先生

艾勒曼-延森先生

阿卜杜勒·梅古伊德先生

迪马先生

阿拉姆·汗先生

拉贝塔菲卡先生

瓦格纳-蒂松先生

西提·沙卫西拉先生

马哈比尔先生

克拉韦茨先生

谢瓦尔德纳泽先生

舒尔茨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 C 2-750室）。

85-61005/A

下午 3 点 1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主席：安理会成员记得，召开安理会纪念会的日期和议程是安理会成员在上个月举行的磋商中商定的。根据协商一致的意见，这次会议的临时议程见安理会议席桌上的 S / 议程 / 2608 号文件。如无人反对，我就认为议程已得到通过。

议程通过

联合国缔造更美好的世界和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

主席：秘书长已经通知我，在安理会纪念会议上，下列安理会成员的代表是外交部长：澳大利亚、布尔基纳法索、中国、丹麦、埃及、法国、秘鲁、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印度的代表是商业国务部长，他是由印度政府正式任命的。马达加斯加的代表是马达加斯加常驻联合国的代表。

我们大家都极为赞赏在座各位所表现的合作精神，因为这种合作精神使我们得以召开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在我们刚要开会之前，议程上又加入了一个未经宣布过的项目，即一项暴风警报；我要强调指出，这是未经宣布过的。现在楼上正在关窗防风暴，这个事实说明我们在下面的人更有理由开窗迎和平。

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我请秘书长讲话。

秘书长：今天，我们要在平静的气氛中开始我们的会议，尽管外面有暴风雨的威胁。

在安全理事会首次会议上，来自澳大利亚的首任主席在开幕词中指出，安全理事会将履行在国际组织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项任务——领导集体行动，以“维持和平、正义和法治。

首任主席的断言完全符合各创始国对关于设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多边机构负责维持国际社会各主权国家间和平与安全这一概念所寄托的信心和希望——而在这个纪念会上又有澳大利亚的一位部长出席安理会，我认为这是最适当不过了。四十年来，我们看到要充分实现这个概念所预想的利益，会有种种困难。我自己觉得不能不提出警告，指出安全理事会并没有在充分实现《宪章》为它订立的目标。然而，即使到现在，我仍然同意安全理事会首任主席的话。安全理事会是一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组织，它的宗旨和责任不是而且无法由任何其他组织来承担。

将近四十年来，安全理事会基本上经常在开会。经常要求各成员考虑采取行动应付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安理会曾多次采取有效的措施，以证明这个受权替世界各国维护和平的多边机构的能力。各国政府一向派遣极有才能的代表出席安理会；多年来，他们的才干、信念和非常辛勤的工作使这个机构的独特性质进一步发扬光大。

我们在评判联合国头四十年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联合国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性质。我认为联合国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的一个不可取代的部分。在维持和平方面负有主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尤其是如此。从总体来看，这个世界四十年来，在通过技术和社会领域的种种进展，应付人类基本需要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联合国在这些巨大的变革中发挥了重大的催化和促进作用；在我们应付其余各种重大需要时，联合国仍须继续发挥这种作用。但是，联合国和它所促成的这些变革迄今未能消除国际社会内部的政治分裂情况。其中有些分裂情况益见加深和恶化。分裂情况的根源在于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国家主张和野心、领土争端、以及全球社会在结构上的改变。

我认为，这种分裂并不是新的现象，而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毛病，这个时代犯着这种毛病，过去各个时代也犯过这种毛病。在今天可见的而且是往往具有毁灭性的症状中，有恐惧和怀疑、恐怖主义、把过于大量的资源疯狂投入军备。以及过于

频繁地爆发冲突。 尽管存在着这种分裂，15个代表所有区域和十分不同的政治倾向的国家仍继续就主要的政治问题，在这个机构中保持接触，这一事实进一步证实了安全理事会的独特性质。 但是，这些分裂已经给安理会本着共同利益履行第一任主席阐述的职责，指导采取集体行动以维护和平，造成了不利影响，这一点很久以来就很明显了。

我不相信安全理事会能够治疗政治分裂的疾病。 但是它必须不顾这些分裂而采取行动。 我认为，安理会的主要任务是限制和降低分裂所造成的危险的高热。 安理会第一次会议上的一位代表曾说，安全理事会的责任不是为和平创造条件，这是联合国体系中其他机构的责任。 安理会的责任是保证和平在实际上得到保障。 在今天，这仍是安理会为实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需要作出的贡献。

自1983年以来，安理会本身一直在为提高其执行这一任务的效力进行协商。 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各国政府内外正对联合国的作用进行评价，这一协商过程在目前可以视为各国评价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们可以从过去的成绩和缺点两方面，包括安全理事会的成绩和缺点两方面汲取经验，并已经这么做。 但是，只有把汲取的过去的经验施诸未来，才对世界和平具有实际的价值。

我恳切希望，通过纪念四十周年，大家能下新的决心：即安理会意见一致地决心明智地使用《宪章》载有的安理会可以采用的措施，解决能这样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在许多问题上，所有成员国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谋而合的。 我深信，建设性地解决这类问题极大地有助于向联合国会员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重申安理会的实际效用。

如果正如许多人在协商过程中所指出的那样，危机往往是在安理会采取预防措施为时已晚时才提交安理会。那么安理会不妨建立一种程序，去经常监测整个世界，以发现造成紧张局势的新生原因。 同样，如果能够商定一个调查事实的程序，在发现潜在的冲突事件时能迅速而容易地加以运用，将能相当有益。

维持和平部队在过去确已证明是防止冲突复发的非常有效的手段，安理会的历次协商中也曾普遍指出这一点，既然如此，那么显然值得考虑采取办法以便将来能够运用这种部队阻止武装冲突的爆发。

安理会集四十年之经验，已有坚实的基础可以进行反省和考虑将来的行动。对于安理会的目标和重要性，没有人有任何怀疑。我们的疑虑无宁是关于理事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当前政治情况下安理会集体采取必要的措施和行动的能力。我希望尊敬的外交部长们毫无拘束地坦诚就这个问题提出意见，因为这才是一个责任重大、最具重要性的机构的成员所应有的态度。

我已经说过，过去10年来，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之间深重的政治分裂，往往阻碍了安理会发生效能。然而这不应该就使我们下结论说，既然这些分裂很可能长期延续下去，将来安理会就必然同样地受到阻碍，不能发挥效能。过去，安理会理事国间重大的政治歧异并没有使安全理事会总是不能采取有效行动处理危机。我们应当研究那些为维持和平采取了真正集体行动的成功前例，以便作为安理会理事国将来行动的指导。同时，过去的失败也要引为前车之鉴，因为将来的世界可能军备更扩充，战争更是一触即发。在那样的世界上，一个没有效能的安全理事会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一个充分发挥效能的安理会集体执行着《宪章》规定的宗旨，是符合全体国家的利益的。

如果与会的各国政府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各国不妨个别地、双边地、多边地去研究如何能使安理会为了和平而采取的必要集体行动不受理事国之间的歧见和争执的影响，以及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就眼前来说，似乎很值得把这个问题放在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期间各国领导人在纽约要举行的各种会议的议程上。

在这个庄严的场合，我要向大家表示，希望这次纪念会能够重甲并加强安理会的权威和威望。要对政治制度加以批评和挑剔是容易的。然而，对全人类来说，重要甚至必不可少的是安全理事会应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并可以依赖的正义、有效、坚定的和平卫士。安理会这一责任乃至安理会本身具有一贯的重要性。由今天

有这么多尊敬的部长们到这里出席纪念会得到证实。我希望这次会议使安理会焕发新的精神，再接再厉全力以赴。

主席：我现在请第一位发言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长爱德瓦德·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发言。

谢瓦尔德纳泽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国成立周年纪念是一个总结过去的教训、估价目前的现实和展望未来的良机。

聚集在此的代表们面临着一项具体的任务，即加强联合国在建立一个更美好世界中发挥的作用，提高负有维护和平与安全这一首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的有效性。

这一任务之所以会如此紧迫，主要是因为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在大会的全会中，我们已经有机会说明了造成目前紧张局势的原因。现在，我只想再次强调，责任完全在于那些不愿意承认时代的现实、一味争取军事优势、寻求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的人。

世界正处于某一种十字路口，要么允许目前这种充满灾难性后果的危险倾向继续发展下去，要么共同努力，避免战争的威胁，结束军备竞赛，把资金转用于解决紧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今天，只有集合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将人类从危险中拯救出来，反希特勒联盟、尤其是联合国的成立都在证明了这一点。联合国的成立和热爱自由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一结论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在当今的核与和平时代尤为显而易见。《联合国宪章》要求所有国家和平相处，睦邻相待，我们认为，各国严格遵守这一要求恰恰就是和平共处的意义——这是唯一能取代核悲剧的合理选择。

确实，正是因为本组织的名字包含了为和平的未来团结各国的努力这一理想，各国才满怀希望和尊敬，用各种语言说出本组织的名字——联合国。

历史表明，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联合国的成员国能够为了共同的利益摆脱在意识形态、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分歧，那么它们就能在加强和平中取得真正结果。在那些情况下，本组织充分发挥了作为一个促进国际合作成功的有效机构所应有的作用。

要现实和负责地对待国际事务，就必须克服目前的紧张局势，重振缓和的进程，为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进行具体努力。

如果问一问任何一块大陆、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什么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那么我完全有把握说，不管他们的世界观、思想意识、民族和文化传统差别多大，他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就是一个没有核灾难恐惧、没有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其他任何武器的世界。

今天，各国军火库内的战争手段多得足以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但尽管这样，它们还是在数量和质量上不断增长。除此之外，即除了这些所谓“地球”武器外，现在还有一些获得外空武器的计划，其中一些可以转瞬间打击部署在任何地方的目标，不管在陆地上，还是在海里、空中或外空。

苏联已经声明，它不会首先带着武器进入外空。但如果其他人这样做了，那么谁也不能指望苏联没有能力采取必要的反击措施。

人类的天才不应用于发明更为精密的自我毁灭武器，而是应该用于攀登科学和技术进展中的新高峰，以改善人民的生活。

这恰恰是苏联目前正在做的事。我国是第一个将人造卫星发射进地球轨道的国家。苏联公民尤里·加加林是举世第一位宇航员。苏联的工程师是建造核电站和核动力破冰船的先驱。

苏联根据其坚定不移的原则方向，已经把一项关于在外空非军事化条件下为和平利用外空发展国际合作的倡议、提交给大会本届会议审议。我们赞同防止外空出现武器，并将它向各国建设性的共同努力开放。应该在军备竞赛打进外空以前，立刻作出这种决定。

根据《联合国宪章》，本组织所有成员都应该为取得裁军作出贡献。当然，所有的核武器国家，尤其是因为它们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首先应该这样做。

苏联已经单方面停止了核爆炸，由于核国家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我们再次敦促它们、尤其是美国以最认真的态度审议一下这一倡议，学一学我们的榜样。至于核查，这个问题完全是人为造成的。今天，一场核爆炸是隐瞒不了的，持相反观点的人也非常明白这一点。

我国提议，就有关消除核威胁的所有问题达成协议，以冻结到彻底销毁核武器。在限制和削减任何种类的武器方面，苏联愿意和其伙伴并驾齐驱。

世界要变得更加美好，就必须消除侵略和武装冲突的温床。今天，这意味着制止干涉尼加拉瓜和其他中美洲国家的内政、制止对阿富汗的不宣而战，制止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有机会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并结束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关键在于不仅要消除目前的冲突，还要尽一切可能防止发生新的危机局势。要做到这一点，《联合国宪章》中关于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和尊重主权等原则就必须真正成为国际生活中的法则。必须强烈反对任何违反这些原则的行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在这一方面发挥特别作用。

苏联在采取行动的时候，一贯相信，所有国家和人民应该在和平与协调、以及可靠的安全条件中生活。我们在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和地域一级的关系中，在为继续和发展始于赫尔辛基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而进行的努力时，在提出全面处理亚洲的安全这一设想时，都努力推进这一目标。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的也是同一目标，在我们提出重大倡议的地方——联合国尤其如此。

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同样意味着一个人民不受压迫、个人不受压制的世界，一个消除了人剥削人的世界，一个实现了各国、各民族完全平等和真正民主的世界，一个确保享有广泛的社会福利、文化价值和最现代化与最丰富知识的世界。

联合国应该继续坚定地维护真正的人权和自由，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应该支持那些正在和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残余进行战斗的人们。

要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所有国家就必须摒弃把经济和金融影响力用作政治恫吓手段的做法。要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就必须消除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歧视，并在公正和民主的基础上加以改革。

在扩大双边互惠的贸易、科技关系，消除饥饿、落后等全球问题，保护环境和探索世界海洋等方面，各国必须进行建设性合作，这已成了我这个时代的真正的当务之急。

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联合国提供的一切机会，这符合我们走向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利益。

作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苏联希望它成为一个真正的权威性的世界和平组织。我们相信，联合国越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它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就越高。正因为如此，我国赞成尽一切可能加强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有效性。

在加入联合国时，所有国家都承诺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为了实现《联合国宪章》中宣布的目标，各国最起码应该做到的是遵照安理会的决定采取行动。

不能容许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成为一纸空文，尤其是那些旨在消除中东、中美洲和南部非洲危机局势的决议。

根据《宪章》，安全理事会拥有广泛的权力，来确保其决定得到执行。如果说到目前为止，安理会还不能够将其全部潜力用于和平。那是因为有些人从自己狭隘的私利出发，来对待联合国。而且，有些人有时候还采取了不能允许的步骤，破坏整个联合国体制。

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最近在就本组织工作的年度报告中，对联合国“得不到尊重，安理会决定得不到合作”。（A/40/1，第6页）表示不安，这是不

无道理的。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他正在根据《联合国宪章》进行努力，促进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通过的决定。

请允许我提一提其他事情。要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就不能只考虑一个国家的利益和观点，不管这个国家多么强大，经济多么发达。不能只为一个有限的国家集团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意味着人人享有和平，而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取得和平。我想在这儿强调这一点，因为这儿是安全理事会，它工作的基础是所有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原则。

当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肩负的责任决不能消除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的作用。本组织的所有其它会员国都必须为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作用。不管他们中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分歧，这些分歧决不能掩盖主要的事情：即他们为消除核威胁、捍卫和平所承担的共同责任。

以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

“谁都想活下去，谁都不想死。因此，我们必须拿出政治勇气，制止正在发展的这一不祥进程。必须制止军备竞赛，开始裁军，并着手改善关系。”

我谨表示，我希望我们今天的会议能产生新的动力，推动加强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在为和平利益和人类福利进行努力中的有效性。

主席：我请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弗拉季米尔·克拉韦茨先生发言。

克拉韦茨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先生，在今年各项重大国际事件和纪念活动中，联合国40周年纪念无疑是特别重要的。40年纪念的特殊历史意义在于：它与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个不可磨灭的事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世界战胜反动力量和好战力量是各国联合起来反对共同威胁的突出例子，是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合作的结果。这启发了《联合国宪章》的制订者写下了如下的字句：

“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

“并为达此目的……和睦相处，并

“同心协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宪章》序言）

乌克兰人民感到自豪，旧金山大会和《联合国宪章》的序言以及第1章中的原则与宗旨都是由当时的乌克兰外长季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主持下的委员会起草的。

40年来，作为联合国成员国，乌克兰一直忠实于《宪章》的原则：不使用武力；不干涉他国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尊重各国主权；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我们一贯支持并继续支持为了和平与人类的福利而建立和扩大互利、平等的合作。

我们认为，联合国为促进这项事业作了许多工作。当然并非每一件事都尽如人意，也不是每个急需解决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对联合国缺乏效率的谴责，其实应该归咎于某些国家。它们虽然承担了一些义务，却并不愿意，甚至拒绝遵照《宪章》的规定以履行这些义务。

我们坚决谴责对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威胁和讹诈政策，这种行径现在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这个国际政府间组织不应该，也不能够成为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工具。正是为了这个理由，它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它的任务是要为所有人民和国家服务。只有大同的世界才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它只有通过大家的努力才能实现。

乌克兰认为，联合国及其《宪章》对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储备着巨大的创造

力。40多年来，它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爆发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本组织成功的领域中，特别应提到25年前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这个《宣言》的执行，对民族解放斗争给予了不可估量的宝贵协助，使几十个以前的殖民地、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获得了独立。年轻的亚非拉国家组成了不结盟运动，它们积极参加联合国各机构的活动并参与作出决定。

通过利用《联合国宪章》关于解决国际冲突，以及防止并制止侵略行径的条款，本组织对克服一些严重的国际危机做出了贡献。

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在谋求加强它的效能的方法和途径的时候，我们再次强调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成败首先取决于各国的政治意愿和争取实现《联合国宪章》制定的崇高目标的决心。这方面至关重要，各国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守《宪章》规定的义务，遵守并执行安全理事会所作出的决定。我们不允许安全理事会为解除危机，特别是中东、中美洲和非洲危机所制定的决议得不到执行。

《宪章》第24条明确地指出：

“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且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

为履行它的职责，安全理事会取得了许多权力，包括有权采取有效的预防性措施和实施全面的、有约束力的制裁。

加强联合国的效能，就意味着全体会员国必须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尽量发掘安全理事会的潜力，强调它的常任理事国一致原则，并且坚定地执行安理会的决定。

我们不当归咎于《宪章》的缺陷，也不应当归咎于联合国的工作，而事实上，我们必须归咎于一些黠武的力量。正是由于这些理由，世界人民在联合国创立40

周年之际，对世界的命运感到越来越担忧。40年前写下的《宪章》在今天的核时代具有同等的意义。它为人类提供了无可限量的机会和更美好的生活和发展的前景，但同时也构成了世界毁灭的真正威胁。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指出：为了战胜世界上现有的困难和危险局势，我们难道不需要所有国家的努力吗？我们今天所从事的这些协同努力的主要任务难道不正是消除核战争威胁吗？

消除核危险，停止地球上的军备竞赛，防止军备竞赛扩散到太空，政治解决冲突，消除紧张局势的温床，在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国际合作，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的正常化，等等，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贯的目标和努力方向。

我们认为，联合国庆祝成立40周年，应该是一个新的推动力，促进各国采取协同努力，实现本组织的《宪章》所体现的崇高目标。历史教导我们，必须在战争发生之前制止战争。

我们没有其他的途径。

推翻目前世界上军事战略均势的政策，取得军事优势，加剧军备竞赛并将其扩展到外空的道路只能导致我们堕入深渊。面对这种威胁，各国、各民族唯一有理智的选择就是遵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改进并发展国际关系。

乌克兰非常重视联合国，它是和平的有效工具，它将尽力促使它的主要工作取得成功，这些主要工作就是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各国间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并发展国际合作。

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成员国将维护和平的重大责任交付给它进行的一个机构，乌克兰准备为它的工作作出贡献。

主席：我要请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发言：

马哈比尔（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我深感荣幸，能在纪念联合国创建四十周年。安理会特别会议上发了言。这次历史性的会议是由在理事会发挥显著作用的创始国之一主持的，这是令人高兴的巧合。我相信，在你智慧和干练的主持下，本次会议将在安理会和联合国的这个紧要时刻起到建设性的作用。

我谨祝贺苏联外交部长，祝贺该国的常驻代表在八月份有效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请允许我向墨西哥政府和人民转达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和人民对于最近墨西哥地震所造成的巨大的生命和财产上的损失，表示深切的慰问。

四十年前，在世界已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灾难之后，它又因广岛和长崎的灾难又感到恐惧，这次灾难是由人类所使用的、最致命的武器造成的。在此之后，人们迫切希望促进各国间的和平，并要求在解决争端时不使用武力。因此，在1945年，51个国家重申了对人类尊严和对于所有人和所有国家平等的信念，一致同意建立联合国。当时，创始国便预见到，联合国将能建立一个更合理、更稳定的国际秩序。本组织是为了取得集体安全而创立的，其目的是为了建立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创造有秩序、能逐步发展和进行经济建设的环境。

我们只要分析一下今日的世界便能看到引起联合国创始国所关注的问题仍然存在。安理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它有特殊的义务，来确定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本组织是否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要确认一些必须采取的措施，以便达到宪章所订的目标。

过去四十年的经验清楚地显示，本理事会能够也必须要创造一种气氛，使我们能认识到，螺旋形上升的军备竞赛是不能保障它所实现的和平与安全的。我们不打算指责任何国家，有意想通过使用其武库里的最致命和最具毁灭性的武器来征服世界。我们相信，所有国家都愿在和平的环境里取得生存的自由，在这个环境

里，他们能改善公民的生活条件，也不会遭到其他国家的攻击。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宝贵的自由是通过花费许多金钱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取得的。我们承认每个国家均有自卫的权力，但是，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不断增多已引起了一场紧张的军备竞赛，它远远超过了正当的自卫的需要，而且还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实上，每年在这些毁灭性武器上都要花费一万亿美元。只需要其中的一小部分，世界的饥饿便能消除。据估计大约每分钟便有三十多个儿童因缺乏粮食和基本的药物供应而死亡，但是，在同一分钟里，三百万美元被用于制造武器。如果花在毁灭性武器上的精力和财富，时间和技术能用来改善人类生活，世界的面貌将会改观。

在回顾过去四十年的工作，并为未来开创道路时，我们需要解决人与人之间不人道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是多方面的，并具有各种形式。

我们谈到更好世界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南非占人口多数的非白人所遭受的灾难，我们谈到能丰富我们社会的崇高的想法时，也不能够忽略人民在本国寻求生存、平等和公正的斗争遭到扼杀的事实。大家都认识到，种族隔离制度威胁了南部非洲和国际和平安全，因此，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对于安理会来说，这个罪恶的制度在提请联合国大会注意以来仍然继续存在了30多年。这是很可悲的。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原来可以采取加速种族隔离的灭亡，但是，那些最有能力采取这些有效措施的国家没能全心全意地加以支持。虽然一些国家对南非所采取行动是朝正确方向跨出的一步，但是，还需要采取一些符合当前严重局势的迫切行动。

在1977年，安理会一致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本理事会所任命的武器禁运委员会的报告表明，某些国家并没有完全遵守这项禁令，这些国家享有特别的权利，因此，它们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站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前列。

种族隔离的继续存在，以及与此相关的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都是无视安理会的决议，它表明我们要保留地庆祝四十周年。因此，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敦促各国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南部非洲的局势升级到完全无法控制的地步，这将给这一地区，甚至整个世界带来不稳定。

当代的国际关系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冲突，这些冲突都有可能升级成为国际危机。这不但在南部非洲，而且也在中东、东南亚和中美洲等地区显示出来。

有些争端需要得到国际上的解决办法，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争端应该在本地区解决，例如，中美洲的局势有可能通过孔塔多拉的努力得到区域性的解决。我们极为赞扬最近由阿根廷、巴西、秘鲁和乌拉圭所组成的支持小组，以协助孔塔多拉的进程。我们注意到下个月将恢复会谈，我们希望它们能够产生结果，而不会受到可能破坏本地区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因素的阻挠。

许多冲突都是由经济和社会问题造成的，所以，没有全球的经济安定，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因此，要求所有国家和国际机构同心协力帮助各国实现经济复苏，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复苏。然而，我国代表团带着某些失望和担忧的心情注意到，人们开始背离多边主义，同时，在国际经济体系里缺乏民主化。国际金融机构必须要响应要求改变它们的政策和办法的正当呼声，以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的动乱，这种动乱不可避免将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世界现已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民主合作已成为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

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状况使得联合国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它也导致了它目前所面临的一部分问题。联合国和安理会遇到了许多障碍：即不尊重、不执行其决定和决议，越来越多的国家单方面使用武力来决问题或实现其狭隘的私利，这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另外，一些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不愿意采取集体行动。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联合国系统已证明还是有能动性的，它能够继续得到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个时代以及四十年前极为不同的会员国的要求。然而如果联合国在追求更美好的世界中要发挥更好的作用，如果安理会要更有效地履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那么，就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在这方面，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秘书长关于本组织的工作向安理会所作的建议，尤其是从1982年9月和1985年9月发行的报告。但是，如果要使这些措施能够发挥作用，那么，某些成员国必须改变态度。

当我们考虑到理事会在过去四十年里所采取的行动，我们不得不同意秘书长所表示的观点：安理会

“常常由于不情愿预先阻止，或者预见一些危险的局势而受害，或在仍然能够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不愿使用安理会的权力而受害。”（A/40/1，第6页）

因此，这次特别的纪念性会议应下决心不但要处理冲突，还要消除冲突的根源，才能使世界免于战争，建立持久的和平。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是一个小国，它不可能威胁任何其他国家，也很难阻挡强国对我们的那怕是最普通的攻击。我们对作为理事国责任的态度，是要促进国际信任的气氛，我们认为，建立信心的措施，能够减少紧张局势，促进各区域里的国家或各国之间的善邻的关系，这是不可缺少的，只有这样，才能普遍地改善国际关系的气氛。本理事会应设法促进相互的了解，并相信没有任何国家想统治别国或用暴力解决争端，我认为本理事会如果能帮助解决现有的冲突中比较次要性质的问题

那么就会出现日益增长的信任气氛，以致连超级大国也不再把对方视为敌人，而仅仅是对手而已。 这是否希望太高呢？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安理会两个常任理事国将在今年十一月进行的首脑会晤。我们希望会谈将能建立两国间更好的工作关系，并且促进更多的合作和了解。 这便能极大地改进国际关系的气氛，促进安理会，以至整个联合国的工作。

《宪章》给予一些国家以否决权，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不应该用否决权来违反《宪章》的原则，根据《宪章》的规定，国家的权力越大，它们的责任也越大，我们认为应认真地考虑来确定一些非程序性的问题，以便限制或停止否决权的使用，这将提高理事会的效力。

秘书长必须得到在《宪章》允许范围内的更大的灵活性，以便在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机或潜在的危机发生的时候发挥防范性的作用。 在危机的情况下，他应得到所有各方的政治上的和实质性的支持。

联合国和安理会无疑地应为自己维持和平的活动感到自豪，但是，这个办法需要加强并得到改进，这是需要超级大国的协商一致以及争端各方进行合作的关键领域之一。

安理会应更经常召开高级会议，这也是《宪章》所设想的，这些会议应该审查各方在促进解决现有的争端中所做的努力，并分析现有的国际环境。 这将促进各方交换意见，以克服误解和猜疑，因为这些误解和猜疑往往会导致僵局和冲突。

令人震惊的是，正当世界的危险和挑战需要有最大程度的国际合作加以消除之时，我们发现多边的解决办法遇到极大的威胁，对于共同的利益的了解和对于集体的责任和协商一致意见的需求正在被狭隘的私利、教条主义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论争所取代，而且，人们越来越多地诉诸于威胁，这种趋势必须扭转。 不然的话，我们将难以回避全球的灾难。

联合国是国际合作的中心，各国可以通过对话和劝说来维护和追寻它们的利益。

只有在会员国允许的情况下，它才有效。如果将目前世界上的所有危机都归罪于联合国，那是不公平的。有些是因为根深蒂固的政治现实、态度和观点所造成的。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希望，（而我觉得这并不是一种梦想）我们能通过一些措施，在理事会里建立善意，使理事国团结一致，并互相信任，这样就无需通过军事优势来争取安全了。因为这是不可能办得到的。

所以，我们要求安理会所有的成员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重新献身于《宪章》的原则，而且要记住国际关系要影响到百姓，我们必须设法避免冲突，我们必须拿出更多的善意、信任，而且利用对话和合作，我们必须同意存在不同的看法，来实现我们各自国家的目标，我们必须认识到和平不仅意味着没有战争，也意味着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权利、消除饥饿、贫穷、疾病、失望和不公正。如果我们办得到的话，国际和平和安全就不会不断地受到威胁，那么，我们就不用为将来担心。这将是一个更好的世界。

主席先生，在感谢你的同时，我表示相信，如果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便能一起取得成就。

空军上将西提·少卫西拉先生（泰国）：主席先生，我谨以泰国代表团的名义表达在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这一历史性会议时的愉快心情。你担任主席职务这一点适当地证明了安理会成员对你的信任和信赖。泰国和联合王国由可追溯到许多世纪前的友谊和友好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都具有建立已久并受到人民拥戴的君主制。贸易和文化联系进一步巩固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贵国深受泰国人民的尊敬。因此，请允许我与你的其他同事们一起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这一庄严机构的主席职务。我国代表团深信，在你的领导下，安全理事会纪念会议将在良好的谅解气氛中顺利进行，并取得圆满成功。

我还要向贵国大使，约翰·汤姆森爵士阁下表示诚挚的敬意，在前三个星期内，他精干、庄严而有效地履行了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责。他的个人和职业的品质赢得了我国代表团对他本人和贵国的尊敬与钦佩。

我也很高兴转达我国代表团对八月份安理会主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阁下的深切谢意。

我悲痛地惊悉墨西哥在上两个星期不幸遭受自然灾害。我代表泰王国政府、泰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通过你向墨西哥政府和人民转达我们深切的慰问和同情。

今天有15国外长出席这一历史性的会议，这本身就表明了我们对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工作的重视。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庄严的场合来审查、反省和重新估价我们组织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尤其是联合国这一主要机构的作用。

我们已经收到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精彩报告。在此，我要说，我们有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和能干的秘书长是多么幸运啊。尽管他来自第三世界，但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并对全球利益和范畴具有洞察力的国际人物。我国代表团要对他的报告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报告反映了他对改进我们组织的坚定承诺和对其未来作用的真正的关切。

尽管安全理事会经常受到重复的批评，我国代表团同意秘书长的评价：

“……安全理事会在提供安定和限制冲突中发挥了重要，并经常是主要的作用”，

而且“有一些方法，安理会可根据它多年来的工作方针提高其能力”。

我们聚集在这里纪念联合国成立40周年。周年通常是欢庆和沉思的时刻。我们今天欢庆世界在过去的40年中没有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众所周知，如果发生战争，将意味着我们所知的人类文明的毁灭。然而，当我们浏览每天报纸的大标题，或者看一看提交到这个庄严机构的问题时，我们不能忘记，和平仍然不是地球上的正常事态。因此，这个欢庆的时刻也正是在我们进入联合国第五个十年时深思一番的时刻。

我们今天正在估价，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是否能维护和平与安全，以期——用创始国的话来说——“使后代免遭战祸”。当我们环视世界时，我们到处看到战争和战争的威胁。在某些地区，战争未爆发，因为军事联盟维持了一种靠不住的不战不和的局面。在这种全世界都不安全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为发挥《联合国宪章》授予它的作为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的国际机构的作用能做些什么呢？

首先，安全理事会成员必须回顾一下《宪章》，因为它为安理会的作用提供了法律基础和指导方针。《宪章》宣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初手段是和平解决争端。依照第三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安全理事会应要求双方在将问题提交安理会审议之前，首先谋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安理会应作为一种惯例要求，在安理会确定争端双方业已认真地诉诸于各种和平解决的手段之前，任何争端不得提交安理会。安全理事会不应匆忙开会，对一个特定的问题作出裁定，除非它确认，有关双方已探索了其他和平途径而未获成功。因为，安全理事会机械地接受任何联合国成员国提出的召开会议的请求，将耗费其道义权威，并有被用作宣传和论战场所的危险。如果安全理事会要重新确定其作为国际争端的最高仲裁权威的话，首先它必须根据可得到的证据明断地审议这些争端。

安全理事会为加强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之能力可采取的第二个步骤载于《宪章》第三十四条；该条授权安全理事会调查任何争端或可能引起国际摩擦或惹起争端之任何情势。目前还没有任何工具可由安全理事会用来有规律地发挥上述作用。也许，这一点可以通过增加为安理会服务的秘书处工作人员加以补救。但是，另一项有效的解决办法也许是鼓励并授权秘书长用一切手段收集情况从而使秘书长能更好地根据《宪章》第九十九条行使职权，将其所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秘书长在安全理事会的作用不应局限于咨询或监察。他应被授权成为安全理事会的“耳目”，并定期地向安全理事会汇报他掌握的有关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态发展的情报。此外，秘书长的代表在调查事实中可因此而具有安全理事会更高的威望和权威，从而为履行其职责提供便利。这样，联合国秘书处的地位将得到提高，同时，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三十四条完成其任务的能力将得到加强。

安全理事会为确保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不被忽视或被轻视而可采取的第三个步骤是，一旦问题提交安理会，要鼓励情势或争端的当事国进行真诚的谈判。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被称作“玻璃房”，有人甚至称之为世人瞻观的“金鱼缸”。如果安全理事会要确保，它在人们的眼里不是一个“公共外交”场所，而

是一个经过认真的谈判能够产生实质性结果的论坛，那它就应该尽量减少用于听取与争端无直接关系的国家的有讲稿的发言时间。反之，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争端当事国，让它们在安理会主席的领导下，或在秘书长的协助下、或在根据《宪章》第二十九条所设立的，由安理会部分成员组成的“调停委员会”的协助下自己进行谈判。重点应永远放在和平解决争端上，而不只是保证通过另一项决议，因为没有和平解决，这种决议一旦通过就会被忽视，从而逐渐地削弱了安全理事会的威信和权威。

值此纪念联合国成立40周年之际，我国主要关心的是看到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重新恢复其作为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组织的合法地位。作为一个小国，泰国高度重视联合国，认为她体现了我们追求一个没有战争和暴虐的世界的希望。我们将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这个机构看成是小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自由、庄严地生存的权力的最后捍卫者。我们希望对捍卫这些权利作出菲薄的贡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庄严的机构争得一个席位。正象已故的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所说的那样，我国相信：“只要你仍然可能有所贡献，你就还未做够，你永远不会做够”。因此，我国吁请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成员国为实现《联合国宪章》序言中表达的宗旨作出各自的贡献；“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尽管我们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可能不尽相同，但是我们是同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现状必定反映出人类当前的处境。因此，促进人类的进步应当是我们最崇高的目标。目前人类的大部分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这种时候真正需要做的是从上述角度来估价这一问题。不得不忍受巨大苦难的人们，不论是哪一国的公民，都怀有《联合国宪章》所载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心愿和理想。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他们的心愿和希望的共同点。也许，这就是互相依存——有益于普通百姓的相互依存——的真实含意。

因此，百姓的含义不仅是指他们享有国际社会最基层的成员资格，而且还包括他们怀有共同的人类理想和心愿。

主席：我感谢泰国代表对我国家和我个人所说的友好的话，特别是他对于我国常驻代表约翰·汤姆森爵士的客气话。

现在我请秘鲁外交部长蒂松先生发言。

瓦格纳·蒂松先生（秘鲁）：安全理事会主席、各位外长、秘书长先生，我要表示我国感到多么的高兴，看到您，主席先生，联合王国外交大臣主持这次安全理事会的纪念会议，庆祝联合国创立四十周年。我相信在您的明智的领导之下，各位参加会议的外交部长将能够把这次庄严的纪念会议变成一个非常明确的努力来恢复这一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机构的活力。

关于《联合国宪章》的作者们的理想，以及他们的基本主张和规范原则里的超然内容，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在今后几天内还会进行很多讨论。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所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机构，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方面的，都从一开始就充满着一种怀疑感，一种由战争这样毁灭性的经历中产生的怨恨感。1945年的政治家们，虽然他们奠定联合国的结构范围，确实从而制定了国际社会文明的标准，但是他们还是给联合国注入了一种现实的态度，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认识，认为五个战胜的大国有一种监督的作用，就是说使较弱的国家似乎无限期地从属于它们。因此联合国就成了各种深刻的动机，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深刻的动机包括理想主义的和实际的两类，有时不一定很明确，也不一定相符的。

联合国没有取代国家，也并不是进行促进友好关系和交换无害语言的场合。对联合国的评价，必须参考国际生活的具体情况。

我们大家都知道，导致原来的国际政治合作这个概念崩溃的理由在一方面是因为大国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发言尖锐化了，另一方面在裁军方面又没有平行的进展及集体安全的制度化。这是需要彻底履行《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的责任的两个基本的支柱集体安全的概念和恐怖平衡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必须同时设计一些机构使我們可以在安全的范围内进行工作。

为了使安全理事会有新的生命力，我们必须尊重国际权威，正如秘书长在报告中所指出的——他在本组织的工作使我国感到自豪。现有的国际各种文件也许是足够的，只要有真正的政治意愿进行合作，尤其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但是这种意愿似乎还是缺乏的。因为一些明显的历史的情况使我们有一个唯一的集体一致的意见：就是大家都感到泄气，

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严重停滞不前，演讲泛滥以及安理会在对待国际政治问题上的一种强制性的抑制态度。这是审慎完全不同的。这不仅是对过去四十年中的危机进行惯例的回顾。而且也是逐步地。有系统地把一些实质性问题置于联合国的范围之外。这种情况，在政治方面，只是说明了大战时所建立的这个机构已经过时了。在经济和财务方面也同样的明显。这个秩序是要建立一种建立在含混不清的国际法准则的概念基础上的民主的集体安全制度，主要是否决权带来的困难，使得中小国家更为困难，我们并不是说中小国从属于大国是造成联合国所有问题的根源，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样一个机构的责任是为了维持和平与安全。大国所承担的义务促进这些，为国际社会服务，而不是为他们自己政治和安全的考虑。

因此，联合国在1985年不能仅仅作为一个庞大的缺乏政治意愿的合作机构生存下去。它必须符合国际形势新的现实。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产生了同一政治根源。

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新的政治作用，必须承认建设性的主权的作用，这是应该属于所谓发展中世界的。这种向前迈进的一步，就是说接受一个前提，即当今的世界是相互依存的，这是一个事实，而不是理论。这不可少的第一步给予联合国机构以它们所缺乏的有效性。

换言之，联合国是不可能很好地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除非它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在今后的投票中，能保证一种有效努力来谋求协议与和平。

所以，我认为所需要的不仅是大国的政治意愿的改变，这将能带来裁军和集体安全的平行进展：还需要我们有协商一致的意见，即落后这个问题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造成国际政治气氛的周期性的混乱。欠发达也是不公正的结果。它是战后世界脆弱和平的根本基础。

因此，不可能有进步，不可能走向一个真正的政治协议，除非至今还不能参与的国家起到真正的作用，进行真正的谈判、讨论。如果这些国家不支持这一建设性的作法，克服这种好象只是重复的作法。

各国代表团的建议和秘书长的倡议，认为安全理事会不只是在自己的范围内考虑，而且应该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当今世界令人不安的问题。秘鲁是支持这样的建议的。但是，安理会只是考虑某些定期爆发危机的麻烦地区——如在波斯湾、南非、阿富汗、中美洲和中东——这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足以克服破坏侵蚀这个国际制度的事态发展。

我们认为，第一就是要允许秘书长能够在哪些与全球战略关系不大的地区和问题上，采取行动。然后，将来的道路还是充满了危险的，但是这条道路将通向未来，不会导致重新回到国际上的无政府的状态。

另一方面，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有时理事会通过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作用的决议，但却不能得到执行。因此，秘鲁认为现在是应用《宪章》所要求的行动来取代我们的抱怨的时候了。例如，在纳米比亚和其他问题上，人们无视安理会的

决议。 所以，就要采取《宪章》第十七章所规定的强制性的制裁，来停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这是我们作为自由人，在良知上所不能容忍的。 只有这样，才能恢复联合国这一最高国际机构的声望。

主席先生，在世界历史上，人的关系都有不完善之处。 但是产生过1914年和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造成巨大灾难的本世纪也还做出了努力使人民团结起来。 联合国是这些努力中最好的一种，但也是需要改进的。 因为现在国际合作的有效渠道瘫痪了，特别是南北之间的鸿沟不但威胁到联合国本身的存在，而且也威胁了多边主义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可取的，又是可望不可及的，难以实现的。

我们现在面临着更大的威胁，一些国际组织变成了强权的工具，损害了弱小国家的切身利益，也就威胁到了它本身的生存的可能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采取的政策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点，安理会的否决权也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

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同平时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的国际上的斗争在形成，导致一种压迫性的超国家的政策的产生。

尽管有这些困难，我国仍然希望它能继续生存下去，建立真正民主的国际秩序，在这样的秩序中，我们通过以文明的方式寻求一致意见及所有国家的发展，通过我们各国人民真正的合作，来实现和平，而不是通过只能造成依赖的施舍来实现。

主席先生，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不再是仅仅起遏制现有冲突的作用的机构。它应当超越这个作用，不应当只起到会议厅的作用，让各种不同的意见得到发表。我们应当放弃这样的想法，即安理会不仅不是解决严重冲突的机构，反而使冲突进一步加剧。

主席：我感谢秘鲁 外 交 部长的发言，以及他向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马达加斯加常驻代表布莱斯·拉贝塔菲卡先生。

主席：感谢秘鲁外长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马达加斯加常驻联合国代表布莱斯·拉贝塔菲卡先生。

拉贝塔菲卡（马达加斯加）：今天，我很荣幸地向你表示我国政府特别高兴看到你主持这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安理会会议来庆祝联合国四十周年。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让·本门南贾拉先生由于迫切和无法预见的公务不能出席会议。他要我向你转达他真诚的遗憾，并祝愿审议工作顺利。

自年初以来，由于我们是联合国成员，由于我们负有特别的责任，为了恰当和庄严地庆祝四十周年，安理会成员国进行了紧张的磋商。因此，我们选择“联合国缔造更美好的世界和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为主题是十分正确的。

人们也许会以选择性或二分法的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分别为我们期待联合国做什么和在满足各国人民需要和愿望方面安理会应发挥什么作用。但是，这将不符合起草《宪章》前言时的精神，我们坚信国际和平与安全应在全球范围内来理解，这必须包括防止战争、保护个人和人民的基本权利，各国的平等和法制、维护正义、履行国际义务、促进所有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四十年前，这些都是争取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条件，尽管他们今天仍有待实现，但他们的意义仍然存在。

因此，只有当我们消灭了对峙和猜疑，才能消除全面战争的危险。只要常规与核军备竞赛存在一天（这一竞赛现已扩张到一切环境），只要会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的冲突和紧张存在一天，对峙和猜疑就会存在。

同样，除非我们准备承担集体责任，除非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行使他们按照《宪章》规定的特权和履行义务时同意在他们之间寻求尽可能多的共同立场。安全的概念（我们认为它与经济安全不可分割）就不可能充分实现。

我们觉得可取的是各会员国的合作是很必要的，他们应承担《宪章》规定的共同义务，在他们的关系中，同意遵守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互相尊重、

互相受益、不使用和威胁使用武力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

我们刚才提到的几点常常导致不同的解释，但是，他们并不矛盾，按照应永远存在于我们中间的协商一致的精神，他们可以被视为我们行动和决定的中流砥柱。

秘书长报告中有关安理会的部分已经成了安理会成员不断充分交换意见的主题。我们要特别感谢他提醒我们几个重要的问题：安理会在军备控制和在促使我们想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集体制度的审议方面的作用；防止、控制和减少冲突；完全一致的必要和安理会中合作磋商的精神；各会员国随时准备促使安理会采取行动。

显然，如果我们成功地把秘书长的建议付诸实施，继续和发展他所提出的思想，我们就会已经为一个更好世界的开端作出贡献。国际社会已正确地找出了我们的缺点和弱点，并期望我们通过我们自己来加强我们决策和以符合《宪章》给我们规定的用来行动的能力。

在这方面，使安理会在履行其职责时瘫痪的主要障碍是我们不能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及时找到广泛的协商一致意见。双边分歧和我们利益方面的不同倾向于压倒我们对国际社会的义务——这给安理会的权威和完整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并破坏了各成员国对我们的信任。

除此行不行？我们把许多重要的问题搁在一边：纳米比亚、种族隔离、巴勒斯坦、中东、塞浦路斯等，我们仍在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更不要说那些被故意忽视的问题了，这是因为有关方面觉得没必要或不宜于让我们来处理这些问题或人们受到特别和一时的利益的指引，我们尚未准备审议这些问题，更不用说提出解决他们的办法。

我们也必须考虑途径和办法来加强安理会和秘书长各自的预防作用。正如秘书长刚提醒我们，那将包括建立一个能有助于防止危险危机的迅速报警制度；授权给安理会和秘书长甚至在没有正式注意问题时采取主动行动；能把安理会的努力同区域、国际和次区域机构相协调或联系起来那就更好了；最后，寻求新的和解程序，

使这个制度对介入的各方有更大的约束力。

然而，如果我们充分利用《宪章》，无论是第六章、第七章或第八章所提供的一切资源，我们采取有效和有系统的行动的能力就会提高。因此，我们将能保证我们提出的任何解决办法和方式符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不会导致任何发号施令的政策。

我们强调继续依赖《宪章》的规定表明我们忠于鼓舞本组织创始国的崇高理想，表明我们相信安理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能力。对我们这些既没有威慑力量又没有足够的军事潜力的国家来说，我们只能依赖于安理会在和平和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中的作用。

但是，无论我们的期望和决心多么有理和中肯，它们本身不能说服安理会去更有效地履行其职责，或使我们更接近《宪章》的目标或加强对这些目标的尊重。

归根结底，国际安全意味着所有国家的安全，应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支持，这样和平才能由所有国家和人民来实现。那样，只有那样，我们才能有更好的世界可言，一个终于消除了有任何形式的统治和剥削、恐惧和不义的世界。

主席：我现在请印度商业部国务部长库尔谢德·阿拉姆·汗先生发言。

汗先生（印度）我首先要说，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你主持安理会的会议。紧密联系我们两国关系的是悠久历史联系背景下的友谊和多方面合作。我们是英联邦的伙伴成员国，在你干练的指导下，我们期望着本次纪念会议上富有成果的审议。

与数位尊贵的外长一起同聚于纪念联合国四十周年的这次独特的会议实在是一种特殊的荣誉。我们出席这次历史性的聚会，证明了我们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合作的集体承诺。我们今天在此会晤，目的是要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联合国缔造更美好的世界和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我们的讨论应给我们提供机会，评价联合国在过去四十年中的工作，并决定加强安全理事会履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作用的效能的方法和途径。

在这个以怀疑和不信任、歧视和不平等、紧张和冲突为特点的世界中，在这个核危险威胁着我们生存的世界中，联合国一直是希望的灯塔。在联合国成立的四十年中，它在各个不同领域中成绩斐然，它在非殖民化进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它促进了社会、经济进步，造成了对人权的普遍意识，它推动了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编纂。尽管联合国的成绩辜负了创始会员国的期望，但它仍然提供了人类最美好的希望和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事实证明联合国是审议当今最紧迫的问题，寻求解决我们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紧迫的国际和平、安全和全球经济合作问题的最恰当的论坛。虽然联合国受到各种批评和冷嘲热讽，但是，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联合国的世界。

1983年，印度已故总理英迪拉·甘地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宣布，坚信联合国是不结盟运动的核心。本月初在安哥拉罗安达结束的不结盟运动国家部长级会议上，一百多个国家的部长表示深切和坚定地致力于联合国，维护并加强这个组织，使它更有效地实现《宪章》中所载的宗旨和原则。

在我开始讨论赋予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特别作用的问题之前，我要深深地感谢秘书长1985年关于本组织工作的发人深思的报告以及他在本次会议开始时的发言。他的分析深刻，建议务实，在秘书长以往历次报告的启发下，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其目的是要就加强安全理事会效能问题交换意见，我们希望这将能为加强安全理事会的效能，并全面恢复整个联合国的活力铺平采取具体、有意义和现实行动的道路。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条款，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尽管安理会在防止战争爆发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并成为多方面的“安全网”，其弱点和缺陷使它不能成为《宪章》所设想的有效工具。特别是，我们觉得，安理会缺乏团结一致的精神，这阻碍了协商一致。成员国缺乏必要的政治意志，特别是强国和富国缺乏作为弱国和小国利益的保护者的意志，这是安理会不能努力实现其基本目标的根源。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根据《宪章》所享有的特别地位，使它们负有超越狭隘民族利益的额外责任和义务。我们期待常任理事国不辜负对它们的信任，履行《宪章》赋予它们的义务。

以核军备竞赛日益升级为其特征的国际政治安全气氛，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创始会员国的构想中，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目的是与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域进展有着密切相联的。《宪章》第二十六条赋予安全理事会建立军备管制制度的主要责任，但不幸的是：安全理事会至今还不愿意处理这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敦促安理会成员国注意这一问题，并要求为实现裁军、消除核战争的危險而采取有效措施。

在这方面，我愿重提一下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先生在1985年1月于新德里召开的六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议。六国领导人公布了《共同声明》，其中敦促核武器国家停止一切核武器的试验和生产，并停止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部署，随后立即大幅度削减核力量。跟随在这第一步之后的将是导致全面彻底裁军的持续裁减军备的计划，伴之以加强联合国系统并确保将大量耗费于军备竞赛的资源迫切转用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措施。六国领导人确定的两个具体步骤是，早日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防止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

当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就秘书长的报告进行坦率激烈讨论的时候，曾有一些宝贵的意见提出，这些意见如能付诸实施，势将加强安理会代表国际社会从事集体维持和平与安全的特别责任，从而使它更接近《宪章》为其所规定的位置。我将简单谈谈其中的某些意见。我们非常重视安理会“防御性外交”的作用。我们值得考虑下列的各项措施，例如经常地进行非正式的努力来控制危机形势，派遣事实调查团、并同有关各方进行非正式会晤等。

我们认为：应当充分利用《宪章》第九十九条赋予秘书长的责任，使他能在适当和必要时奉行“静悄悄的外交”，发挥斡旋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强调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根据《宪章》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的至关重要性。

我们欢迎安理会维持和平的活动，并建议在必要的情况下进一步利用《宪章》第六和第七章所规定的手段。此外，我们强调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召开正式定期会议的重要性。我们希望，在我们这次部长级会议之后，将有更高政治级别的定期接触。

我们欢迎秘书长在其最近报告中提出的三个具体建议。我们完全赞同他的意见，认为安理会的成员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应当放弃任何双边的分歧，优先考虑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安理会成员国应当竭尽全力来解决我们面前的一、两个重大问题。我们想到了由于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而四分五裂的南非局势。纳米

比亚问题和中东局势，特别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第三，在纪念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高度重视重申《宪章》义务，特别是有关不使用武力和成员国和平解决争端的义务。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联合国的会员国已增加到 1 5 9 个，接近了会籍普及的目标。 因此，我们认为，相应地增加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已是刻不容缓了，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反映联合国会员国的增加。 这将更能使安理会代表所有各方的利益，从而更有效地根据《宪章》行使其职责。 这里我们当可回顾许多不结盟国家，包括印度在内曾在大会内就增加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数目以确保安全理事会具有均衡代表性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我们希望，这一建议将得到它应得到的注意。

我们还愿就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相对作用简略说明我们的观点。 毫无疑问，安全理事会负有特殊的责任并享有特殊的权力。 同样，作为世界组织的大会具有道义和立法权威，可以就《宪章》所规定的一切问题提出建议。 《宪章》旨在使联合国成为一个完整有机的整体，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这两个机构的目的是要分工合作，为促进和平与安全的事业共同努力。 两个机构之间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或对抗的余地。

正当联合国进入第五个十年之际，我们作为安理会的成员的确感到荣幸。 在我们担任理事国的期间——这与我们担任不结盟国家运动主席巧合——我们和其他国家一起，为促进和平与稳定而工作。 我们坚信，《联合国宪章》的主题基本上是健全的，需要的是会员国的政治意志，使联合国努力实现自己的基本目标。 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审议将给所有成员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以新的推动力，使安理会成为它理所当然的有效工具。 一个有效和敏感的安理会肯定会有助于整个联合国系统活力的恢复。

主席：我感谢印度商业部国务部长对我说的良好的话。

我现在请法国外交部长罗朗·迪马先生发言。

迪马先生（法国）：我仅谈谈讨论中项目，即审议安全理事会的作用。

此次会议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1970年曾召开过一次安理会的部长级会议。但那次会议是私下召开的，附带地说，代表各成员国出席这次会议的并不都是部长。由于这一原因，该次会议对国际舆论没有影响。

今天的会议是公开的。我们愿意这样。私下外交有其好处；常常是有效益甚至是必要的。但这不是安理会的自然作用，本理事会应该是采取公开立场和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进行辩论的。

我们认为《联合国宪章》生效40年之后，这点就更必要了；今天的传播速度和视听通讯工具的影响使得在国际公众舆论和有外交职能的机构与个人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非常必要。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联系非但没有加强，而实际上是削弱了；今天，在安理会与世界公众舆论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鸿沟。在过去几年里，安理会的形象和威望受到损害，这也就影响了整个联合国组织。事实上，本组织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之间的平衡；根据《宪章》规定，安理会以其组成与行动规则更倾向于采取行动，大会的审议职能是受普遍会员制和发言平等原则所指导的。安理会的任何软弱都会危害这种平衡，因而损害本组织的有效性和信誉，不利于其成员。

在有众多国家与政府首脑参加下，大会隆重庆祝本组织40周年之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是不能消声匿迹的，否则的话，它就把自己从国际舞台上抹煞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对安理会决定召开这次纪念会议并以联合国为更美好世界和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为其主题而感到特别高兴。

我认为这是所有安理会成员发表关于安理会应该如何更好地履行其职责观点的机会。在我看来，重振安理会是庆祝本组织40周年的最好方法。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的首要目标，而这又是安全理事会的主要责任，难道我还需要重复这点吗？

我不要在赘述本组织在维护和平领域内软弱的种种表现和原因了。已经说过不知多少次了，特别是秘书长曾多次指出；秘书长自其第一份年度报告以来已经作了同我们观点基本一致的分析。

本组织并不是一个超国家，不是一种“世界政府”。它是主权国家的机构，包括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因此，它很接近实现《宪章》中明确规定的普遍会员制的目标。因此，本组织很有必要地反映着当今世界各种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社会分歧。

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会经历困难，甚至失败。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根据《宪章》条款，它应是为了“共同目标而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这就特别说明，它需要解决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指明，某些问题不是没有在联合国内得到讨论和解决，就是产生一些纸上谈兵的决议。

这样，本组织和安全理事会给人的印象上不过是“音箱”或是供宣传的舞台。

本组织中某些重要成员之间的不和当然是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原因。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职能的模糊也造成了这种现象。人们看到一种以安理会上的辩论来替代大会辩论的趋势；安理会应该是采取行动的机构和关注安理会所有成员和争端与冲突主要方面，而大会是给本组织所有成员提供机会，发表对某个局势的意见。

另一个原因在于每个成员国对本组织责任感的削弱，这点表现在无法执行的决议泛滥和过分使用集团间谈判。

我相信在座各位会一致同意应该对这种局面作出反应。但如何做呢？

当然不会是进行体制改革。这样非但不能改进本组织的功能，只会削弱潜在有效性和带来分散的主题，而我们都要寻求谅解的共同点。

《宪章》已经规定了能使本组织起到其维护和平作用的构架：

— 安全理事会在该领域内负有主要责任；通过其组成和功能规定，安理会仍是最适于履行这一职责机构；

— 根据《宪章》第98条和99条，秘书长有其独特的作用；

— 最后，根据其性质和《宪章》所赋予的职能，大会以不同的形式也能够，并且应该作出一定贡献。

工具就摆在那；方法也有。所缺少的就是政治意愿，缺少充分利用本组织的决心。会影响目前职能的一些调整也许是有用的，但这些调整是第2位的，而不是主要的。

在此方面，常任理事国有特殊责任，法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法国最近曾几次通过把它认为应该由安理会审议和采取行动的重要问题提交安理会而表明法国对安全理事会的重视。同样，我国支持不管来自何方的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倡议。法国将继续为改善安理会成员间，特别是常任理事国间关系而努力。

由于这一原因，法国一定会欢迎秘书长在其最近年度报告中提出的第一个建议，该报告要安理会成员优先考虑双边争端中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

特别重要的是，安理会必须从东西方辩证法交织在一起的逻辑对峙中摆脱出来。执行真正不结盟政策的安理会成员无需等待人们所期望的主角关系的改善，而做出重大贡献。

安全理事会为了重振其威望，应充分行使其职责，不应陷到形式上的辩论和没完没了的不公开争论之中。为了再次成为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机构，它应在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问题采取公开立场，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不要再成为人们到此来申诉的地点。

正如秘书长建议的那样，我们认为，为了表明这种决心，安理会应该立即努力解决一两个那些避免东西方辩证法的问题。只要其成员有采取行动的意愿，安理会是能完成这一任务的。法国就有这样的意愿。秘书长充分起到《宪章》所赋予的作用同样是重要的。我想他会同意我指出这一点，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只有在秘书长感到他能得到安全理事会成员的支持时，他才能起到应起的作用；他必须同安理会保持密切磋商采取行动，同安理会成员保持信任关系。当秘书长履行安理会赋予的任务时或在其职权范围内做出维护和平的有益行动时，法国愿意支持他。正如秘书长多次解释过，并在他为促进解决某些国际争端和冲突而采取的行动中表明的那样，目前秘书长职能的概念似乎是最好的。

正如秘书长本人所强调的，成员国对他所表现的信任不应使它们免除自己的职责，这种情况有时是会发生的。

这是及时的提醒。如果成员国不采取现实负责态度，如果它们特别是不愿在安理会内使责任感超越对团结的尊重或民族利益的狭隘概念，本组织，特别是安理会就不会成功地完成《宪章》赋予的任务。

我们不要躲藏在有其自己意愿而又不受其成员国控制，表面上很舒适的官僚机构内。归根结蒂，本组织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成员国的集体意愿。

为了使本组织回到有效的道路上来，我们应充分履行我们成为联合国成员时所承担的职责。对某些成员国来说，参加联合国已经有四十了。法国在此方面已经下定决心。

梅古伊德先生（埃及）：首先，我要代表埃及代表团赞赏法国的这个建设性的倡议，要求在联合国40周年的时候召开部长级安理会会议。埃及与所有理事会成员都支持这个有价值的倡议，它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审议过去四十年以来本组织的存在，分析它的成绩和它积极消极的方面。

我今天非常高兴，在你的主持下，在联合王国外长的主持下开会。我国与贵国关系密切，我们的个人关系极好；我对这些关系感到自豪。

我非常荣幸，今天以埃及的名义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发言。我非常珍惜埃及作为联合国创始国在起草、签署《宪章》及多次参加安理会工作时所起的作用。埃及还积极地对本组织所有活动不断做出贡献，与地区政治集团保持联系。埃及对本组织的热情，对《宪章》的坚信，对宗旨和原则的信念，说明了这个历史的事实，在本组织存在之前几千年，埃及人民具有一些感情，就是对和平和维持和平的信念。埃及的公民在开始建立文明的基础时，把它的努力和思想转向建设，我们看看埃及的名胜古迹，就可以看到，埃及人自从历史的黎明时代以来一直是建设的，一直受它的价值原则和信任的指导和。它从来没有花钱去制造破坏性的武器。

埃及的命运使它总是处在世界最动荡不安地区的中心，有各种冲突的问题。它应该承担它对自从联合国成立起来，一直存在的和平问题的作用。埃及与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联系，使埃及能够在联合国的活动中起积极作用，并具有独特的经验，处理自联合国存在起来一直存在的重大问题。

四十年是一段短暂的时期，不允许公正地判断或者是科学地分析联合国的经验，虽然这个时期有些巨大的科技经济成就和进步。我们世界面临的挑战，就是有能力在人的行为中有相应的成就，目的是要在世界各地建立和平安全和平等。我认为，后代会在这个文明面前感到疑惑，它在这么短的时期里有巨大的物质成就，但是没有能履行兄弟人民对解放、自由和行使本组织所赋他们权利的愿望。巴勒斯坦、南部非洲的问题以及世界人民之间重要的经济的差距是永远是一个迷，因为没有获得公正解决的办法。我们必须要了解这种局势，因为我们作为安理会的成员

有责任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以我们必须仔细研究现代世界的这个阶段，考虑大会和安理会的会议中的各种建议。

三年之前，穆巴拉克总统阁下在联大发言时提出了一个审查和评价国际局势的问题，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埃及先前要求一个大会特别会议来讨论联合国各方面的活动，以及它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这个要求获得了许多会员国的支持，这是由于它具有特别重要性。

结果是，埃及很感兴趣地收到了大会主席在本届联大开幕发言中所强调的各点，就是关于有必要召开一个会议来审议《联合国宪章》，以消除《宪章》的精神和文字之间的矛盾。他所提到的关于执行《宪章》第27条的问题，各会员国都认识到，这是给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个双重否决权，而《宪章》的起草人从来没有打算那样做。

在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潜在危险”。

在埃及做历史性选择的时候，它将毫不犹豫地支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做出努力。这也是国家和人民之间共处的论坛。《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对埃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独立的国家来讲，可以保障维护它们的独立和主权，在国际合法性的范围内以及《宪章》宗旨和原则下这样做。

在这个简短时期中发生的深刻改变，会影响联合国的前途。国家之间互相依存的需要也许是这些改革中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这是它们的生存需要，也是它们进步的保证。

当我担任埃及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时，我密切地注意到联合国在处理许多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方面的实际情况。我可以声明联合国在处理世界问题和危机的做法，与《宪章》所主张的哲学有很大不同。它主要是赋予安理会责任，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持国际和平。一方面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另一方面遵守安理会所通过的决

议，来处理任何对和平的威胁。但是，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占了上风，这种状况使大家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渐渐离开了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

我们今天特别需要的是，彻底和科学地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不是说要归咎于任何一方负责，而是要实现互相依赖，目的是要减缓紧张局势，来处理国际经济问题。

联合国成立已经四十年了，它需要一个实际的概念，以便实现《宪章》规定的集体安全制度的有效性，这个制度是这个组织哲学的核心。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联合国的能力，各会员国必须响应它的决议，执行它的意愿，受它的集体的明智的指导，尤其是关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世界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在安全的国际系统之下生活，这些有助于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

只要仔细地研究一下安理会的工作，就会使我们看到，两个超级大国，在我们现在的世界进行积极争夺，这损害了执行《宪章》的规定。同时，也削弱了集体安全哲学的价值和效率，使得安理会这个负责维持和平安全的主要机构丧失了采取果断决定性决议的能力，因而就不能停止侵略和解决国际争端，甚至于不能够执行它一致通过的决议。

经验证明，安理会，特别是在危机多得不得了的时刻，往往丧失行动能力，这是因为它在大多数情况下丧失了政治意志。这就使得安理会不得充分地履行责任，所以它就会变得只能通过一些谴责的决议，或者发出呼吁，或者往往有人滥用否决权，使得国际冲突卷入了两个对抗集团之间争夺的恶性循环。

所有这些事实证明，我们迫切需要审查现在集体安全的体系，使之更为有效。毫无疑问，要巩固集体安全体系，首要采取措施就是各国要再度下决心，遵守《宪章》的条款规定。我们都知道，这些条款具有《宪法》一般原则和规定的性质，它们并不阻碍演变。《宪章》的原则是不变的，但是我们应在其程序和机制方面有灵活性。同时要不断刷新他们，使之符合国际关系的变化。

非常遺憾的是，即便是一直通过的安理会决议，有时也不能执行，有时是由于缺乏政治意识。这说明，我们必须有政治决心，要有能力执行我们的决议。理事会，特别是常任理事国负有特别责任。

要恢复安理会活动能力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集体的决心。冲突的当事各方，也要有意志执行理事会的决定。

这就必须要安理会成员国合作，大会和理事会协调。同时要后续这两个机构所通过的决议。

但是很遺憾，即便那些一致通过的决议，也不能得到充分执行。所以就需要政治决心，要加强理事会的效率，要有集体政治决心。

有各种办法，而成功的机会也不一样。这种创新的方式：比如建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及脱离接触部队，还有秘书长的斡旋，还有定期举行会议来审查国际局势，来注视这种严重事件，这是所谓的“预防性外交”。同时秘书长可以把他认为威胁了国际和平安全的事情拿到安理会来进行磋商。

可以通过不断地使安理会的议事规则合理化并使之更为有效。这些议事规则虽然已经通过了好几年了，还是暂行的。

所以我们必须更新它们，使它们更有灵活性，来反映国际关系的新的需要。同时也考虑到多年来积累的经验。

鉴于上述几点，埃及打算提出一套倡议，要使安理会工作方法程序合理化，以便提高效率，在适应时刻履行它的责任。这个倡议考虑到了秘书长在82年组织报告和今年组织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我们这些建议都是客观的，深刻的，同时是很坦诚的，有助于解决联合国和安理会的缺点。埃及提出想法，是因为我们坚信，需要推动本组织，特别是它的主要机构的工作。

在过去两年中，在安理会非正式磋商中，讨论了这些想法。但是，并没有找到如何实行改革的方法。我们希望，这届周年能使我们有新的动力来做出新的努力，来落实这些理想，来加强理事会的效率。

四十周年的重大意义在于重新宣布信守本组织的原则，要恢复集体行动的信誉，要重申宪章的原则，要在这个原则指导下，谋求实现本组织的宗旨和原则，而且要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埃及在目前的会议上将提出一些倡议和它的实际看法，以便重申我们对集体安全的信念。

联合国今后的任务，特别是安理会的任务，就是要执行它的职责，按照宪章规定，解决国际争端，特别是那些威胁到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争端。安理会通过的成千上万的决议提供了一个基础，应当得到尊重和执行，而且要有有效的执行机构来执行。比如说，安理会涉及到中东以及巴勒斯坦的决议，仍然需要强制性措施。

此外，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回到家园，并且行使自决权的决议也没有得到执行。所以，我们不能接受由于某些方面缺乏政治意志而造成的情况。关于建立全面持久和平的决议，特别是安理会第242号决议，要求更合理地执行。这适用于为恢复所有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包括西岸、耶路撒冷以及加沙地带和叙利亚戈兰高地。

安理会一再呼吁，停止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由于缺乏必要的机制和后续活动，它失去了信誉。

安理会对于在南非发生的一些令人遗憾的局势的集体意志，一再受到种族主义政权的忽视和挑战。

整个世界在注视着安理会如何执行它的职责，如何促进加强它的有效性。毫无疑问，主要的责任在于理事会成员国，要了解到集体安全的重要性，而且要有能力执行理事会的决议，并通过早日预防性的外交，来遏制一些紧张局势，并且解决一些争端。

在结束发言的时候，我们展望未来，看到我们的组织会成为桥梁，使得各种文化、文明以及价值观能够结合起来。我们期待着一个时期，到那时，我们组织能够迎来一个国际关系的新时代，以和平、正义和繁荣占上风的，而不分肤色、种族或者是宗教。

在纪念联合国四十周年的时候，让我们朝着更美好的未来前进。我们的心和思想应当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念，相信正义和合法性。让我们勇敢地踏上没有人走过的道路。然而，要在理解而不是对抗、对话而不是单独讲话、真理而不是欺骗的指导下这样做。和平是我们的手段，也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应当执行我们的任务，并且不辜负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任，以便缔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艾勒曼·彦森先生（丹麦）首先我要向你表示我非常高兴地看到由你来主持今天的会议。我相信，在你卓越的领导下，我们一定会圆满地完成我们的讨论。

丹麦对联合国的强有力的和始终不渝的支持是众所周知的。从一开始起，我们就把我国在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看作是丹麦对外政策的基石。我们对联合国所起作用的这一信念做出了实际的表示：例在我们以语言和实际行动对联合国在经济、社会和技术领域工作给予有力支持以及我们在安理会所进行的努力。

安全理事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能够完成《宪章》所赋予它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这一首要责任的原定工作。然而，不一定非要全部履行了它的职责才能算是真正的成就。我完全同意秘书长的意见：在实际的国际生活环境中，安全理事会在维护稳定和限制冲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并往往是关键性的作用。

我们参与安理会工作的指导思想包括如下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我们要努力使安理会成为一个谈判而不是辩论的讲坛。安理会应当和大会截然不同的职能。这两个机构都很重要，但各自的作用却有所不同。

安理会为了要保持自己的权威，并加强其对国际事件的影响，它就必须以一个统一的声音发言。这就是丹麦为什么以一直在促进安理会内部的协调一致。安全理事会具备了全体一致的意志，才能向冲突双方发出清楚而毫不含糊的信号，并确保安理会的决议能够得到切实地执行。

第二，这也是和第一点相关的，我们希望看到安理会应当在区域范围内处理区域冲突，而不要把它看作是东、西方之间世界性争雄的后果。我们绝无意于把各种促使区域性冲突恶化或有时甚至引起这种冲突的因素加以简单化。解决这些冲突的努力必须集中在这些区域本身的原因上，而这些原因往往是带有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性质的。与上述指导方针相比，安理会的工作并不是十全十美的。

有关南非问题，我们对安理会过去九个月中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感到鼓舞。丹麦政府在这一问题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很多年来，我们始终认为南非的局势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也是整个南部非洲紧张局势的根源。为了以和平方式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国际社会必须增加对南非的压力，并且通过采取适当的措施使这种压力更加有效，这些措施也包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应采取的措施。

目前的局势要求安理会大大采取现实和灵活的态度，并认识到从安理会向南非传送毫不含糊的信息的重要性。我们高兴地看到，人们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安理会不能表达普遍反对种族隔离的立场，那末从中获利的只能是南非政权。

就黎巴嫩南部的局势和两伊冲突而言，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联合国宪章》中有关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任务，我们会看出：两伊战争刚好是联合国能够予以解决的问题。然而，虽然秘书长在安理会的支持下进行了不懈和卓有才智的努力，终于达成了某些成果，把这场血腥、滥杀滥伤的冲突的势头压抑了下来，但是安理会仍没有真正发挥它所应当起到的作用。

最近，安理会成员国表达了它们的强力支持。秘书长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任务。作为一个二十多年来一直对联合国在该岛维持和平的部队做出自己贡献的国

家，我们和秘书长一样，相信自从他在1984年8月提出倡议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应当最终为尽早达成一项公正和持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协议奠定基础。因此，我们强烈促请各方在未来的几周内，为尽早达成一项协议而加倍努力与秘书长合作。

自从秘书长提出其第一次年度报告以来，尽管他也同时明确提出了现状中的缺点，但他还是提请安理会和本组织各会员国注意改善这种局面的机会。他的意见对我们的思想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启迪。在这方面，我要回顾北欧五国政府有关加强联合国作用的观点的报告，这份报告已在1983年6月提交给秘书长，并在本届安理会上分发给各成员国。在这份文件中，我们提出：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召开安理会的定期会议并把它作为建立预警制度的一部分以及秘书长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九条规定更经常地行使其特权，那是适宜的。

在秘书长最近一次的年度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些有关提高安理会地位和加强对安理会尊重的具体建议。我们尤其赞成其中如下的建议，即：安理会在不久的将来要做出坚定协同的努力，以解决摆在它面前的一个或两个主要问题。我们认为，安理会应当立即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处理南部非洲的问题。

总之，任何人都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联合国的世界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但是为了加强安理会在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事业中的作用，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我们已开始踏上新的征途，时间不会倒流。当务之急是要实施《宪章》中的各项条款；首先冲突各方应当具备利用安理会这一机构和遵守其决议的充份政治意愿。

在这个大方向所取得的进步；会免除人类的巨大苦难并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在四十周年时的口号“联合国争取更美好的世界……”。

主席：我要感谢丹麦外交部长在他开始发言时对我说的美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先生。

吴学谦先生（中国）：首先请允许我热烈地祝贺您担任本月安理会会议的主席。您为解决中、英两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和促进国际合作所进行的不懈努力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值得称道的。作为您的一个老朋友，我深信，由于您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卓越的才能，这次重要会议在您主持下将会取得成功。

正当联合国隆重纪念它诞生四十周年之际，安理会举行这样一次外长级会议，来探讨“联合国争取美好世界和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责任”这一主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各国人民渴望在和平中把世界建设得更美好。四十年前，人们正是为了防止战祸再起而建立起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以维护国际和平、制止侵略行为的主要责任。尽管这四十年间没有发生世界规模的战争，但是剧烈的军备竞赛，此伏彼起的局部冲突，都使和平经常受到威胁和破坏。安理会今天所肩负的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更为重大了。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为了建设更美好的世界，人们要求安理会能更有效地履行它的崇高职责。我们安理会理事国应当对这一合理的愿望做出积极的响应。

回顾四十年，安理会曾经审议过世界上的许多冲突问题，并多次就解决有关问题通过决议，在预防、缓解和制止冲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应当肯定的。同时也应看到，安理会过去在某些问题上也曾作出过违背和损害世界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错误决定。当前存在的问题是：按照宪章的规定来衡量，安理会在履行其职能方面，还存在相当的差距。在联合国广大会员国要求它对破坏和平的行为采取有力措施时，却往往显得无能为力，这是人们所普遍感到关切和担忧的。

战后世界格局中令人鼓舞的积极变化是：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登上了世界舞台，改变了联合国和安理会成员国的组成。第三世界和中小国家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安理会过去工作中成功和失误的事例给我

们以重要的启示。当安理会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映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和中小国家的合理要求，并经过充分协商，集中集体的智慧，我们的工作就有成绩。当出现违背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大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安理会的情况时，我们的工作就遭到挫折。我们应该珍视这个历史的经验，并以此为借鉴共同探索解决现实问题的正确途径。这里，我愿意谈谈如何加强安理会作用的几点意见：

一、安理会的一切活动，包括维持和平的行动，都必须符合宪章的规定，特别是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这就要求安理会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都要严格遵守和维护关于尊重别国领土完整和主权、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协商等原则。

二、安理会在履行其职能时，应当认真听取联合国会员国提出的正确主张，支持它们的合理要求，体现它们的正当愿望。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是要“代表各会员国”行事的，要为被侵略的国家伸张正义。只有这样，安理会的工作才能获得有益的成果。

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忠实履行宪章所赋予的特殊责任。它们应当带头以实际行动遵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尊重并支持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共同意志，与安理会其他理事国平等协商、密切合作。国际上的事情，不应由少数大国独断独行，只能通过各国平等协商才能办好。特殊的责任意味着更高的义务，否决权不应成为庇护侵略和不义行为的工具。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在这几年的年度报告中就此提出了一些设想，联合国的许多成员国和安理会的成员国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包括：加强安理会同大会、秘书长之间的配合与协作；确保执行安理会决议；支持秘书长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的授权而进行积极的活动等。我们认为，这里包含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值得继续探讨。我们真诚地希望安理会为加强其职能和履行其义务所作的努力能够继续下去，并尽早取得具体成果。

为了加强整个联合国的作用，除安理会以外，我们认为，加强联合国大会的职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因为同安理会相比，大会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近些年来，联合国大会在广大第三世界和中小国家努力下，在维护和平与安全、反对侵略、伸张正义方面通过了一些重要的决议。要求加强大会的作用，已成为绝大多数成员国的强烈呼声。我们对此表示支持。

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活动中，我们一贯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正义事业。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在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庄严时刻，我愿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为维护世界和平，为争取一个美好的世界而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主席：我个人要向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表示感谢，感谢他（用他的话来说）对我帮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所起作用方面讲的那些客气话。其实这项工作是一种伙伴关系，因此对这项工作我也要以我的伙伴对我祝贺的同样精神向他表示祝贺。

我现在请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布尔基纳法索外交与合作部长巴西雷·拉塔尔·基索阁下发言。

基索先生（布尔基纳法索）：我国代表团欢迎安理会在庆祝联合国四十周年前夕召开这次会议。 我们非常高兴由你主持这次会议。

四十年前，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教训之后，世界人民表示了他们的共同决心，要拯救后代免于战祸。 他们还宣布：信仰基本人权，信仰人的尊严和价值，信仰男男女女的和各国不分大小的平等权利。

这一共同意志的具体和活生生的表示就是创建联合国，其宗旨包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关系，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和享有自决权的原则为基础，实现国际合作，解决经济、社会、知识和人道方面的问题，不论其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发展和鼓励尊重人权和所有人的基本自由。

今天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应发挥什么作用为全人类促进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这首先要我们知道这“全体人类的更美好世界”意味着什么。 第二，我们要确定安理会应发挥什么作用才能实现这一目的。

我国——布尔基纳法索——被联合国列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对我们来说，更美好的世界就是没有贫民窟的世界。 现在有千千万万的人在这些贫民窟生活，因为他们的肤色是黑的，或因为他们的文化不同。 它还应该是一个消灭了剥削、压迫、垄断、无知、饥饿、干旱和疾病的世界。

对我国人民和我国领导人来说，更美好世界就意味着首先保证每天有面包、有饮水，每个人有健康的身体，并完全消除了文盲。 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我们对“更美好世界”的理解。 在这一具体和现实的范围以外，布尔基纳法索只能提出这一概念的枯燥理论，其他人对“一个更美好世界”已根据自己的经历做出了他们的解释。

当然，联合国的宗旨就是要要把这一世界改造得更美好。 所以，在庆祝联合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不管个别地还是集体地，我们先把这一决心变为现实方面取得了多少成就？

换句话说，我们应个别或集体地进行自我批评，评价我们的成功和失败，并根据这一评价结果，考虑怎样使本组织适应其会员国的新情况。尤其是要检查安理会的情况，因为根据《宪章》所规定的作用，它自然通过采取积极或消极行动来决定对我所提到的目标的实现。

联合国采取了很多建设性的行动。我想提一下一些主要的。例如在非殖民化的任务方面，许多人民和民族由于坚持勇敢的行动，取得了国际主权和民族独立。国际合作在某种程度上也已实现。人类到目前为止逃过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国代表团欢迎这些成就，因为它们表明：各国人民一致行动时能够取得哪些成就。同时它们也标志着人类的未来，因为《宪章》要求我们保护这一未来，我们将沿着这一路线取得未来成就。要这样做，各国就必须具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尊重《宪章》的政治意志。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宪章》经常被违反。科学的繁荣曾使我们希望，殖民主义的基础：种族优越感将消失。不幸的是，我们的一些失败表明：这种优越感仍然存在。有人不接受别人存在的现实，把自己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强加给别人的好战决心导致紧张和流血冲突。

这种排斥、这种消极的愿望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每天都可以看到。每天它都使这个世界两极化，使得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同意说：这个世界是划分为超级大国和其它国家。更糟糕的是，我们允许超级大国把它们的世界观强加给我们。

他们的这种消极意志是令人害怕和令人震惊的，因为他们使我们这些无力破坏这个地球的人感到孤立。所以，今天的人类面临的形势使我们遇上这些新的上帝，他们的一个动作，无论是否理智，就可以结束地球上的生命。

由于这些新上帝已把这个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大厦变为他们通过否决权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的有限场所，联合国已经无能为力，不能最终消除对和平的各种威胁。

布尔基纳法索极为尊重《联合国宪章》。《宪章》拟定时的历史环境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今天不同。人类在这些领域里取得的成就已使各国人民更紧密地走到一起来了，并使人民相互更加谅解和互相渗透。从当时的形势出发，拟定《宪章》的人还是向前看的，以保证它的生命力和有效性。因此我们应该确保，不应以任何借口使它陷于无所作为的危险境地。

《联合国宪章》不是一个历史残余。它应是各国前进的历史。因此各国应确保它能更好地适应现实，这符合各国的利益。我们知道，我们一谈到改革，我们总是被误解。但是我这样说一点不夸大，假如安全理事会并不存在的话，今天绝不可能发明它的。

如果今天的安理会和过去一样其效用是有限的，这只是因为它的结构或多或少不符合历史的前进步伐。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我们应该真诚和建设性地应付改革安理会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帮助安理会履行其职责，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安理会总是激起人们的极大希望。我毫不夸大地说，它的信誉有时受到人们怀疑。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提出我们的看法，谈谈我们认为应如何改进它的有效性并由此如何真正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由于我们有幸从外部和内部观察它的工作情况，我们希望向你就如何加强安理会的有效性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我们建议增加安理会的成员国。

我们建议的根据1963年对第二十三条的修正条，当时安理会的成员国从11增加到15。联合国的会员国已增加到几乎带有普遍性，所以它的结构也应该适应这些变革。我们认为有必要。而且非常重要是的加以调整。

我们建议，由五个常任理事国享有的否决权应得到修改和纠正，如果不废除的话。这种否决权曾造成少数几个国家统治大多数国家的现象。因此在接近二十

一世纪时，很难理解自称为民主的坚定倡导者的国家怎么会接受和延续这一情况。

虽然我们理解《宪章》作者们的主要关切，但我们谴责这一权利，因它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这一否决权，我们认为应重新加以考虑，应表示共同意志，而不是表示某一个寻求给别国强加自己意志的国家力量。

我们接受变革之风，认识到我们应在安理会发挥的作用，以尊重《宪章》，保证人类繁荣。布尔基纳法索在自己的任期内一直尽力克制。但是我们一直关切的是，保证我们对解决世界问题的贡献一向是为保卫世界和平与安全服务。

让我们再一次发挥我们的创造性，发挥我们的意志，改革不符合集体愿望的东西。可以设想，否决权可以根据安理会成员国的地理分布来分配。

改革这样已经过时的秩序，是要我们遵守我们的承诺，并进行努力，实施我们做出的各项决定。我们的决定往往是无效的。

我们建议在1986年召开安理会的高级会议，讨论裁军问题，因为我们认为它与整个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

当然，这是很不正常的情况：这样一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问题竟没有包括在安理会的议程上。

在这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正是布尔基纳法索就要离开安理会的时候。我国代表团希望，每一个人都将听到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他的联合国工作年度报告中发出的呼吁。

“和平与安全是人类所需要的。人类不需要对峙，不需要意识形态集团”。

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一个机密宣誓：要促进建立一个对所有人都更美好的世界。

我们有责任把世界变为适合于全人类生活的地方。让我们把力量联合起来，

改正这种悲惨现象，如儿童的饿死。 要保证人们对不公正的现象和秩序进行斗争。要消灭军备，而且应以统一的意志来为人类生存而备斗。

让我引用我国总统汤姆斯·桑卡拉上校的一段话：

“我们各种族应团结起来，在经过长期奋斗之后，各个家庭都可愉快地团聚。 这时，过去的人们又会回到地球上来，生命的火花会在各个地方闪光，历史将向着未来永远前进！”

主席：我现在请澳大利亚外长比尔·海登先生阁下发言。

海登先生（澳大利亚）：主席，我意识到，我是第十四个有机会打开你刚才提到的那些窗口的人。这表明，我们已有机会就我们关心的事务通通气。我相信，其结果会是十分积极的。

联系着我们两国的共同和持续的历史与民主传统的纽带使我要特别表示，澳大利亚代表团和我本人高兴地看到你——尊敬的联合王国外交大臣——来主持本次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安全理事会会议。

四十年以前，澳大利亚同其他五十个国家一道，参加了创建联合国的工作。这是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发展，我们曾从小国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有关这方面重要意义。在那之前，大国曾就发动战争和结束战争的各种方法作出决定；但所有国家都无一避免地被卷入这些决定所产生的影响。大国为自己寻求近乎垄断权力；但它们却未能把智慧垄断起来。和平已变得不可分割；一国发动的战争现在会危及所有国家。

强权的现实——其对国际关系和势力范围的存在的决定性影响——为人们所清楚知道的。但小国也感到自己有权持有自己的看法，有权要求在新的国际安排中将它们的观点作为决策过程的一个因素得到接受。

四十年以前，这有助于培养大国与小国间的一些感情。今天，情况也许依然如此。联合国的重大价值之一就是，在四十年之后的今天，小国仍然能就有关它们的福利的问题发表意见。

这些问题之一就是军备控制和裁军以及美苏关系对它的影响。澳大利亚是西方联盟中一个坚定不移的成员；对此，我们不必感到不好意思。但超级大国间存在的不信任以及它们的对峙造成的危险，也是我们大家感到关切的。我们并不天真。我们知道：如此深刻的分歧不可能一夜之间就一厢情愿地去掉或消除掉。

但我们也敦促两个大国认真对待我们的关切。我们敦促它们——在本届庆祝联大四十周年的大会中和十一月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在它们利益相互抵触的方面

就限制发生冲突的危险的必要性达成谅解。我们敦促它们寻求一切渠道来有效地实现军备控制和裁军。在我们这方面，我们决心继续提出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各种想法——特别是通过有效和全面地禁止核试验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想法，以此来协助推动这一进程。

小国对大国日益控制事态的局面表现出了一致的关切，大国对此必须理解。大国必须认识到人们普遍持有的担心，即它们中任何一方出现的严重的估计错误，或对它们之间紧张和复杂的关系的管理失灵，都有可能最终造成灾难。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免受核战争的后果。事实上，现在几乎已经不可能无视甚至是区域动乱的后果。

请看一下南非局势造成的连锁反映。南非政府阻碍纳米比亚独立和对邻国发动侵略的做法威胁到了世界秩序，澳大利亚对此深表关注。当然，南非政府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来自它的实在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在南非正在出现极其严重的悲剧。如果联合国多年来不断向南非发出的警告的话，受到重视的话，这场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相反，南非的白人少数正通过野蛮粗暴的国家权力来否认基本的人权，似乎决心以此来维护其政治与经济特权的核心理心。

澳大利亚坚信，应当对南非实行制裁，以此作为一个严重的信号：即如果要想使那个不幸的国家避免为流血的浪潮所席卷，那就必须根除种族隔离制度及其全部机器。

澳大利亚政府已在官方投资和贸易方面对南非采取了行动。我国政府已制定了一项行为准则。根据这一准则，在南非开展业务的澳大利亚公司保证不利用种族主义的劳工法和种种做法，从种族隔离中获取利润。我们正在准备将在下个月召开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来指定一个由国际权威人士组成的小组，就使南非根据成人普选实现向多种族社会的和平过渡提出建议。

我们并不是要南非屈膝。我们只想使其以理智来指导行动。我们现在就要这样做，以免目前在南非发生的暴力行动波及到南非边界以外的地方。如果南非政府到现在为止对其采取的有选择制裁和自愿措施不做出反映，则澳大利亚坚决认为安理会应考虑下一步骤：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

这使我要谈谈最后的重要一点。它关系到安理会的作用和效能，特别是秘书长最近报告中对此所做的评论。

我们应当认真努力，将秘书长的建议有效地付诸实施。在解决重大争端，利用《宪章》第九十九条所赋予的权力，亲自将争端提交安理会方面，秘书长发挥了宝贵和建设性的作用。去年，他派遣一个调查团，对有关两伊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消息进行了调查；1983年，他采取了主动，以结束福克兰群岛发生的敌对行动。对于使秘书长作为调解人、仲裁人、谈判者或推动者更广泛地参与寻求方法，解决有可能破坏和平的国际问题等建议，澳大利亚政府表示支持。

澳大利亚是安理会的成员。因此，我们一直努力帮助提高安理会进行静悄悄外交的能力，例如，通过减少在安理会审议时发言的人数。我们曾建议，定期召开的会议应有系统地审议国际安全的状况。安理会的责任并不是坐等危机真正爆发之后再要求秘书长努力解决危机。

秘书长建议安理会应采取一致行动来解决其所面临的一个或两个重大问题。我们对此也表示赞同。我认为，安理会应加倍努力，以结束两伊战争。澳大利亚政府曾建议：安理会应分别同冲突的双方举行私下的会晤。在这样的会议上可以私下探讨寻求解决办法的进展范围。我们必须帮助打破这一僵局。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我上面所说的实际和可以实现的改进将提高安理会在维护和保卫和平方面的效能。在这一方面，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想法并未促使安理会今天召开一次不事声张的非正式会议。如果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我们就可以就如何使安理会更有效地工作自由和坦率地交换意见。尽管如此，我仍希望我们在这

次较为正式和庄严的会议上进行的交流将会有益。

我们的责任毕竟是巨大的。我们必须牢记一点：倘若安理会未能对目前危险的环境所提出的挑战做出反应，则我们也许不会再有四十年时间。如果安理会要应付这些挑战，那就应该象秘书长提醒我们的那样，必须加强安理会的权力和权威。现在，安理会对维护和平来说十分重要，不允许让其陷在繁琐、次要和不搭界的事务中。在我们历史的第二个四十年开始之际，让我们采取一种坚定的政策，改善安理会，把它作为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作为我们将安全交给我们子子孙孙的主要工具。

主席：我谢谢澳大利亚代表那么客气的开场白。

我现在请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先生发言。

舒尔茨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要和已经这样作的人一样，向我们的主席致敬，因为阁下与贵国在联合国内以及你们在世界的种种问题上，一直不懈地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四十年前，联合国及其《宪章》体现了人类建立一个更好世界的最美好愿望——那是一个国际争端能够得到和平解决、自决得到促进、经济合作带来繁荣、人权得到尊重的世界。四十年来，这一伟大远见一直鼓励着世界人民。今天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成员，为了我们的人民和后代，有责任保持这种远见。

在坐的各位对我们的世界或联合国都不抱幻想。全球各地仍然存在着国际冲突、侵略和暴力，仍然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遭受苦难，仍然威胁世界和平。贫穷和匮乏的百姓仍在遭受饥饿和疾病之苦。在世界许多地区，独裁者的铁鞋依然践踏着自由和最基本的自由。今天的联合国组织困难重重。但这部分是因为它反映了这个混乱不安的世界。

对一些人来说，我们这个充斥着罪恶的世界就是联合国已经失败的明证，联合国的创始者只不过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我们这项理想主义的冒险已在动荡的现实中分崩离析。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联合国的创始者并不是糊涂的理想家。他们是政治家，也许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对他们来说，联合国并不是医治世界弊病的万应灵丹。他们知道在一个充满主权国家的世界中追求《宪章》的理想是一项无止无休、而且常常是令人失望的任务，需要所有国家表现出毅力和努力工作。

然而他们对未来抱有信心。他们相信，规定各国向往并为之努力标准将使更加接近最美好的世界。他们把各自的国家带上了一条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终点的道路，始终一往无前——走向更大的繁荣、自由与和平。

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藉口以衡量联合国的考验。我们的目标必须是继续前进，克服障碍，力必进步。我们同时必须把实现目标的理想与在这个不完善的世界上如何最好地达到目标的现实结合起来。联合国可以成为和平与人类进步的力量，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意愿和智慧。

我们在过去四十年间目睹了许多成功的事例。在朝鲜、刚果、塞浦路斯和戈兰高地，联合国维持和平与恢复和平的努力在关键时刻起了宝贵的作用。联合国通过各专门机构帮助消灭了天花之类的疾病；向全世界成百万难民提供救济；在健康、通讯和运输领域里向人类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在所有这些方面，联合国都忠实于《宪章》原则，世界因此已经变得更好和更安全。

不幸的是，联合国也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失败了。我并不是说联合国未能改造世界和铲除我们周围的弊病。那将真正成为乌托邦式的幻想。我指的是联合国未能忠实于自己和自己的原则；联合国未能向我们提供必要的指导，使我们能够不走弯路，一直走向更好的世界。

联合国常常被滥用来为狭隘的、自私的国家或集团利益服务。它常被作为发展仇恨和偏执演说的讲台——就象在10年前通过把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的决议那样。各国和人民间的争端与分歧经常被扩大和加剧，而不是通过理智的辩论和讨论加以解决。《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常常遭到歪曲和操纵，以便为违反创始者理想的目的服务。

我们是能够做得较好的。我们对后代负有恢复并保持这个伟大组织持正不阿的责任。我国认识到联合国能起重要的作用。我们全都这样认为。美国全心致力于保护联合国免受伤害和滥用。我们决心使《宪章》原则得到尊重和遵守。只要对联合国继续是一种善的力量具有一天的希望，我们就一直这样做。杜鲁门总统40年前说道：

“我们庄严保证将致力于联合国组织的成功。”

今天，我们的希望经过了现实的考验，我可以代表全体美国人告诉大家：我们的意志并未衰退，我们的决心没有动摇。

我们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是世界希望的中心。在坐的主要大国在建设我们都渴求的更安全、更和平的世界方面具有关键的作用。《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协助解决争端的极大的权力。为了和平的利益，应当合理和勇敢地使用这些权力。

我们看到安理会创造性的行动能够为解决一些我们时代最棘手的问题提供基础。例如，第242号（1967）决议为恢复中东和平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和法律构架。我们的经验就是，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要起作用就必须是现实、平衡和具有建设性的。相反，单方面的行动和决议不能也久远不会起作用。有选择的谴责常常加剧了局势。

我们必须使安全理事会寻求和平解决方法的工作尽可能有效。这需要安理会在冲突的初期更大地和更有系统地介入；更广泛的调查、观察和斡旋能力；理事国之间更广泛和定期的非正式磋商；秘书长更多地运用99条规定的权力提请安理会注意具有威胁性的局势。

我注意到议席四周已有多人就安理会应作些什么事情讲了差不多是同样的话，所以对其中一些问题可能正在出现一种协商一致意见。

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履行联合国创始者为安理会制定的作用的更大决心。安理会议事厅不能被当作谩骂、意识形态和政治对抗的又一个场所。正如秘书长在其

最近的报告中提出那样，安理会成员国是和平的监护人；其它国家都起不了这项重大作用，在创建40年之后，让我们再次保证致力于这一任务。

我们也对未来抱有信心。不能因为道路艰险就中止40年前开始的跋涉，或偏离《宪章》规定的途径。我们不应该失望或变得愤世疾俗，而应作建设性的努力，使联合国更好地为最初的目标服务。

从经验中得出的真正教训就是要不断地加强信心。联合国已经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它还能做许多工作来帮助世界维护和平和改善人类条件。实现《宪章》目标方面的进展使我们能够把理想与现实融汇在一起。

联合国未能实现所有崇高目标不应使我们失望。我们无法用一支笔或一个恰当的词语改变世界，但我们可以确保使联合国指引我们直接走向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必须继续制定鼓舞我们更努力工作和坚韧不拔的远大目标。正如里根总统两年前对大会所说的那样：

“你们有权怀有美好的憧憬。你们有权为自己的人民建设更美好的世界。我们都有责任为更美好的世界努力。作为关心别人、爱好和平的人民，想象一下我们能够结成多么强大的善的力量。让我们再次抱有联合国曾经有过的幻想。”（A/38/Pv. 5，第13—15页）

主席：我感谢美国国务卿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不是作为主席，而是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和英联邦事务大臣的身分发言。

我首先感谢各位同事今晚出色、深刻、雄辩地在安理会发表他们的卓见。我也要同各位发言者和同事一起向联合国秘书长表示敬意。

大家知道，他曾担任他的国家常驻联合国大使，有在秘书处多年服务的经验，完全有资格担负这个任务。他决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我们都对他表示感谢。

我非常荣幸有机会代表联合王国主持这一历史性的会议，用我们的经验和与联合国的联系，作出我们的一点贡献。因为联合王国也是《宪章》的起草国之一，也是1946年1月17日在伦敦召开的第一次安理会的东道国。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参加联合国的工作。我国也是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参加安理会的一系列活动。

我们的特殊责任是众所周知的。我同意中国同事的意见，作为常任理事国，我们应该记住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如果要求对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迄今的工作作个评价，今晚大多数发言中的评定就是，它不只是十五个国家发表十五种不同国家观点的论坛。法国代表称安理会为各成员国寻求共同点的场所；马达加斯加同事谈了合作磋商的精神，丹麦同事提出应以一致的声音讲话。

这次会议比我们有人期望的更加明确地表明，指导我们工作的应是明确的目标感，在很大程度上，情况确实是这样。

当然，同任何机构一样，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安理会的作用和工作方式有所变迁，但它没有忘记印度代表所指出的目标，《宪章》第24条规定安理会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机构。四十年没变，今后也不应变，虽然工作方式有了变化，并将继续变化。多年来的变化这一就是从强制变为说服的机构，我们最杰出的工

作常常不是公开的会议，而且私下讨论这种和其他的方式使我们多年来取得了一显著的成功。 丹麦同事的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

“不完整的成功也可以有真正的价值”。

美国国务卿也提到在确定解决条件问题所取得的成就，第242(1967)和 338 (1973)号决议作为中东和平蓝图的重要性及第435号决议作为纳米比亚问题进展基础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寻找具体成绩，那么，秘书长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及其他代表都提到了维持和平活动的重要性。 坐在秘书长后排的布雷恩·厄克特先生认为，维持和平部队是冲突各方停火的一个国际台阶，是维持停火的手段。这是一个好发明。 在黎巴嫩二十多年的联黎部队，塞浦路斯的联塞部队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条。 今年，联合王国为联塞部队捐献了近2,400万英镑。 我们并不吝惜这笔钱，因为联塞部队表明了维持和平部队的作用。

但我们仍有一个问题，即安理会是否象人们期望的那样有效。 用苏联代表的话说，我们能否汲取前车之鉴，或象布尔基纳法索外长所提出的，寻找新的动力，还是束手无策？我认为是有希望的。

核查任何机构，人们有时都可能泄气。 1946年邱吉尔谈到联合国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联合国本身四分五裂，充满各种利益、意识形态、政策和感情的冲突，那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倘若我们尽心尽力只能建成一座空想之塔，一堆文件，那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今天晚上的辩论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种种答复。 秘鲁大使指出，我们必须拒绝辩论言词的和千篇一律的诱惑，泰国代表赞同，提出这里是一个严肃外交活动的场所，而不是剧院。

因此，我们要考虑如何要把问题提交安理会。如果我们只是在这里相互争吵、辩论，安理会就会无能为力。如果我们要在这里进行对话和政治谈判，我们就可以发挥有效的作用。在讨论中，人们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办法改善我们的作用。

或许最重要的是重申了安理会各国应有作出改进努力的责任。每个理事国都对提高安理会效率负有责任。法国和埃及的外长都提出，这里所缺乏的往往是必要的政治意愿。

我听到舒尔茨国务卿提出许多发言的一个共同点——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响应改进的意见，许多人把这归功于秘书长，即安理会从事于预防性外交，召开定期会议讨论并未正式提交安理会的问题，秘书长在问题早期就提醒安理会注意，以及严肃审查我们的工作程序。公开辩论并不是讨论所有问题的最好办法。辩论的最佳结果无非是通过决议。非公开的正式会议能减少宣传的因素，加强安理会建设性作用。

大家已就如何改进工作方式以及使用这些方式争取什么目的提出了众多的建议：现实地承认，并非所有争端都是可以通过某一组织解决的，也现实地提醒大家，有些并非东西方冲突性的长期争端因得到新的关注。他提好几个，两伊冲突并不涉及大国的利益的矛盾，全世界普遍赞成解决，但安理会的作用取决于有关各方的积极支持，我们希望这不久能实现。在这一问题上，秘书长的努力极为重要，应得到大家的支持。

另一个是阿以冲突，通过谈判，平衡地解决这一冲突的紧迫性十分明确，以第342(1967)号决议为必要基础，保证以色列的安全生存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我们可以欢迎侯赛因国王的倡议，可以促进逐步争取全面解决的努力。

塞浦路斯是另一个例子，这里联合国的作用是关键，因为双方都相信联合国。目前的倡议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但这里秘书长再次需要安理会的支持。

南非局势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大家关注的问题。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提出，我们在那里看到人与人之间非人道最突出的例子。我们都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问题上，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进行根本的改革；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行动有效地促进这一目的。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安理会沦为一个辩论的场所，为强制性贸易禁运争论不休。应该想一想，是否能在南非的问题上发挥说服的作用。

舒尔茨国务卿的发言出色地概括了今晚许多代表的一个共同观点，即联合国比40年前更重要、更有用；我们已经作了这些努力，我们还要继续迈进。

我们认为到，安理会在当今和未来问题上的作用取决于会员国使用安理会的决心。

安理会能集中注意，制订解决问题的基础，促进谈判。但是我最终能否成功地做到这几点决定于成员国是否愿意承认安理会权威，利用安理会的作用。

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审查如何使安理会更有效，如何使整个联合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用今晚澳大利亚同事的话讲，为了秘书长和今后的秘书长以及我们所服务的世界人民，我们应该这样做。

最重要的或许是要我们所代表的成员国检查自己的行为，支持《宪章》的理想，寻求实现联合国目标的可行途径。

安全理事会会有很大的成绩，但能争取更大的成绩。我们要在这一历史性会议上明确地告诉全世界：安理会决心再接再厉争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现在我继续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安全理事会成员授权我代表他们作如下声明：

安全理事会于1985年9月26日（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外交部长级公开会议，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

会议由安全理事会九月份主席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大臣主持。发言的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泰国、秘鲁的外交部长；马达加斯加常驻联合国代表；印度商业部国务部长；法国、埃及、丹麦、中国、布尔基纳法索、澳大利亚、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外交部长。秘书长也发了言。

纪念会的议程是：

“联合国争取更美好的世界和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责任”

值此纪念联合国四十周年之际，安理会成员很高兴，能有机会由高级代表重申他们根据《宪章》所承担的义务和继续忠于《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他们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广泛的审议。他们对和平还面临着包括核威胁在内的各种威胁深表关切。他们虽然承认联合国并非总能根除这些威胁，但强调联合国仍然不失为谋求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积极力量。他们欣然看到联合国的会员国不断增加，已接近实现他们所赞同的会籍普及的目标。

安理会成员意识到《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任，意识到常任理事国的特别权利和责任。他们强调安理会内应有和衷共济精神，以便安理会作为维持国际和平的主要机构能协同采取深思熟虑的行动。他们承认国际社会寄予联合国的极高期望尚未完全实现，但他们保证再接再厉，履行其个别的和集体的责任，以防止和消除对和平的各种威胁。他们同意在审议国际争端、威胁和平、破坏和平、侵略行动事件时，采取《宪章》所规定的各种适当措施。他们

对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多次作出的宝贵贡献予以肯定。他们再次要求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根据《宪章》，恪守其接受并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定之义务。

他们同意，迫切需要加强安全理事会履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首要职责的效能。因此，他们决心继续研究各种办法，以进一步增进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执行任务的效能。为此，他们特别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中向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提出的各项建议。他们对秘书长的历次报告表示感谢，并鼓励他在《宪章》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发挥积极的作用。

到此，安全理事会纪念会就结束了。我宣布休会。

下午7点25分散会。